

日本人

訪港見聞錄 (1898-1941)

上卷

陳湛頤 編譯

序

二十世紀初，隨着海運交通的發達，日本人出國外訪者日多，取道香港或來港工作、居住的人，較十九世紀後期大幅增加。這些人當中，不乏在日記、文章中談及他們對香港的印象或在港期間的見聞、感受者，筆者透過港、日圖書館的藏書、互聯網等接觸到這批材料，經剪輯、翻譯後，按年編次，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至一九四一年日本攻佔香港前為止，共計五十一篇，再加上三、四篇日人以香港為題的座談會記錄，彙集成本書，供讀者參考。

不同種類的見聞記

輯入本書的見聞記，體裁甚為豐富，包括旅行記、日記、報告以至報章的特稿等，撰述者亦遍及各個階層，現分述如下：

旅行記、日記等

旅行記、日記佔了見聞記的最大部份，作者既有官方人員，也有民間人士。

官方人員主要是外訪的代表團。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方抵港訪問最高層次的代表團，是皇太子裕仁⁽¹⁾的訪歐團。一九二一年三月，裕仁乘旗艦「香取」到歐洲進行官式訪問，途經香港，一行在港期間出席了多項港府安排的參觀活動。對於裕仁訪港，當時香港的報章有廣泛報導，日方除駐港領事館、陪同裕仁出訪的官員分別向本國的外交部作匯報外，個別隨行人員如東宮武官長奈良武次也撰寫了日記，記錄外訪的細節，本書即節錄了日記中相關的部份（第廿四節），希望有助瞭解其間的一些內情。出於保安的考慮，裕仁在港的活動刻意保持低調，行程極度保

密，除了在港的日本人團體舉行過歡迎會，掀起過一陣熱鬧之外，一般香港市民中間並未產生太大的反響。裕仁以外，一些皇室成員的訪英團赴歐時亦取道香港，並稍作勾留，例如一九一一年四月由東伏見宮依仁親王、王妃擔任團長，前往英國參加英皇喬治五世加冕儀式代表團便道經香港，本書收錄了隨行的陸軍大將乃木希典的訪港日記，以反映一行人在港的活動及對香港的觀感（第十七節）。

就代表團而言，踏入二十世紀後，日本政府其實鮮有派遣專門的代表團來港進行訪問或談判，一方面因為港日間不存在重大而需要逼切解決的課題；即使偶有事故發生，如歷次爆發的反日暴動，往往也繞過香港政府，直接由英、日的高層官員在東京或倫敦進行接觸、商議，因此，日本官員過港，多是路過性質，與港方官員會面，屬於禮節性的拜訪居多，間或就中國、特別是華南的地方事務與港方官員交換意見，僅此而已，因此，有關的旅行記、日記多涉酬酢而不及重要的政治、外交議題。

較諸官方人員、代表團，民間人士在日記、旅行記、報導等留下的訪港記錄更為豐富，他們來自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職業：

一、文學家。早期有夏目漱石（一九〇〇年過港，下同）、島村抱月（一九〇一年）、有島武郎（一九〇七年）；中期有金子光晴（一九二九年）、石川達三（一九三〇年）；後期有橫光利一、高濱虛子、武者小路實篤、島崎藤村（一九三六年）、綠川英子（一九三七年）、野上彌生子（一九三八年）等。出於寫作的需要，部份文學家有意無意在記錄中運用了較多文學的筆法，或曲盡背景、情節的細節；或着意刻劃人物的性格、心理變化等，如島崎藤村的《走向海》（第二十節）、金子光晴的《殘酷與非情》、《蜃樓街》（第三十一節）、石川達三的《蒼氓》（第三十二節）、鹿地亘的《「抗日戰爭」之中》（第四十三節）等均顯示這種傾向，以致風格上接近所謂「紀實小說」或日本傳統的「私小說」而有異於一般的遊記，然而，鑑於篇中的人物並非子虛烏有，事情亦不涉杜撰虛構，所以仍視之為旅行記一類而收入書中⁽²⁾。

二・評論家。有大宅壯一、山本實彥（一九三七年）。中國問題專家有神田正雄（一九三七年）和尾崎秀實（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

三・財經界人士。有高橋是清（一八九八年）、澀澤榮一（一九〇二年）。

四・報館的特派記者。有《大阪每日新聞》（一九一四年）、《神戶新聞》的記者（一九四〇年）等。

五・其他界別。如十九世紀末年專營買賣婦女的村岡伊平治，為調停日本黑幫在港的紛爭而來港。「七七事變」後，作為日方談判代表，多番來港與國民黨政府中人進行秘密談判，希望打開中日「和平」之門的西義顯等，都有關於香港的記述。

屬於旅行記一類的著作，還有東亞同文書院歷年旅行隊所撰寫的日誌。東亞同文書院於一九〇〇年在南京成立，創校宗旨是培養有實務能力的人才，從事清、日之間的貿易工作。該書院着重研究中國的現狀，因此很重視實地考察，從一九〇一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間，書院幾乎每年都組織行將畢業的學生，利用暑假兩、三個月、有時甚至是六個月的時間在中國大陸及東南亞作長途旅行，順道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勢、民情風俗、經商習慣以至地方行政組織等。四十五年來，該書院學生參加過旅行隊的人多達五千，走過的旅行路線約七百條，各隊的隊員多撰有記錄，將沿途的所見所聞詳細記載，後來彙編成各種各樣的調查文獻。香港雖非這些旅行隊重點調查的地方，但歷年來過港並作短暫停留、參觀者不少，相關的記錄十分豐富，不過，東亞同文書院旅行隊的日誌等資料，很多仍在整理的階段，部份出版者，亦已有中譯本⁽³⁾問世，考慮到篇幅等關係，故不擬收入本書中。

視察、調查報告

旅行記、日記之外，另一類見聞錄是政府官員、民間機構代表團來港視察、調查後所撰寫的報告。

自一九〇〇年代起，日本便不時派遣調查團來港調查訪問。一般來說，調查團視察的範圍並不局限於香港，往往包括華南、東亞在內，視察的項目大致集中於海事、造船和商貿，視察後大都草成報告書，匯報成果，茲舉數例：一八九九年有農商務省的《清鹽業視察報告》⁽⁴⁾、一九〇一年有大阪商船公司的《華南航路視察回報書》⁽⁵⁾、一九〇四年有海事官伊東祐忠匯報的《英領香港及華南海事調查書》⁽⁶⁾和海事官今岡等的《東洋各港造船業狀況》⁽⁷⁾、一九三九年有滿鐵中央銀行調查科的《香港出差報告》（一一四）等。此外，也有旁及其他分野的報告⁽⁸⁾。一般而言，調查報告書的內容不同於日記、遊記，傾向於就某個特定的行業、機構進行觀察、資料搜集，多細節的描述和數據的羅列，典型的如《東洋各港造船業狀況》，除談及黃埔船塢等的歷史、現況外，還具列船塢的設備、船隻入塢的收費、物料的價格、建造過的船舶、鍋爐、員工的工資等，資料雖詳備，惟性質與見聞錄有別，所以基本上本書並不收入此類報告，唯一例外的是拓務省官員尾田滿、井手瑞穗在「九一八事變」後奉命往華南、香港各地視察後所撰寫的報告（第三十三節），該報告用日記的形式，記錄每天行程的所見所聞，有關香港的部份，不僅反映出一九三一、三二年間港日貿易的狀況，也描述了他們親身感受到的社會氣氛，值得一讀。

總括而言，本書收入的五十一篇記錄寫於不同的時間，跨越不同的時代背景，作者所關注的事項亦因人而異，內容上可謂百花齊放，有些篇幅甚長，如鹿地亘的《「抗日戰爭」之中》，延續數章；有些則僅寥寥數語，如與謝野夫婦的書信。為增加可讀性，個別記錄中記事重出而內容又無關宏旨之處，均酌予刪節，與此同時，某些篇章中則加插「按語」，或進一步闡釋背景；或將相關的資料輯入，盡可能為讀者提供更多的參考和線索。所有文章，除註明引自他書者外，均由筆者譯出。

日本人是個喜歡記錄和慎重保存記錄的民族，近代日本人筆下的文獻、著述，簡直浩如煙海，筆者能接觸到僅是其中的一鱗半爪，掛一漏萬，事所難免，希望以是書作為起點，日後繼續蒐集更多的資料，進一步豐富這個題目的內容和深化各種論點。

下文將就這五十一篇文章的內容作一簡略的概括。

見聞錄的內容

港口的第一印象

與戰後專程來港旅遊、購物者不同，戰前日本人多是外遊途中順道踏足香港的。綜觀一九〇〇—一九四〇年間的記錄，香港給這些訪客的第一印象普遍十分良好。在他們眼中，香港是東亞一個先進的海港，在英國人治理下，市面繁榮、整潔，充滿歐洲色彩的異國情調。一九〇二年過港的財經界巨擘滙澤榮一曾用以下數語概括香港的地位和建設（第十一節）：

香港……灣闊水深，巨舶可直接繫泊於碼頭。市區開拓太平山腹而成，建築物俱作西式，煤氣、電燈、電話、水道等文明設施，式式俱備，百貨匯集，市街殷富，為歐亞交通樞紐、一大貿易市場。一旦踏足島內，猶以為身處歐美之中。

港島市區前臨港灣，背倚高山，船舶一駛入港口，依山而建的房舍便映入旅客眼中，自然與人工交融，構成如畫般的美麗景緻。一九〇九年，當寺田寅彥乘船抵港時，便感受到香港這一份獨特的美（第十五節）：

見有一座莊嚴地尖起的岩石山。據說船隻已駛入九龍和香港之間的海峽。山色嫩綠，甚美。山腹上不規則地聳立着各種建築物，交互重疊。所有建築物都怪異地有點薰污，卻又構成了一幅難以名狀的美麗圖畫。這種美，不是明信片或彩畫式的美，而總似油畫式的美。……

十多年後，一九二五年第一次踏足香港的商人服部源次郎，同樣讚賞香港的黛綠山色和碧水藍天（第廿八節）：

濃霧漸霽，香港的市街在眼前展現。六、七層高熱帶式的大型建築物林立於海旁，翠綠欲滴的山岳屹立於背後。紅磚白牆的住宅在山頂、山腹上隨處可見。海水碧綠而平靜。香港實在是山明水秀，帶有馥郁香氣的港口。

到了一九三七年，作家鹿地亘夫婦從上海乘輪船到港避難，他第一眼看見這個城市，就發出了讚嘆（第四十三節）：

甲板的喧鬧聲把我吵醒，望向窗子，不禁吃了一驚。景色何等優美！以深綠色、潮濕的山坡為背景，由並排的水泥建築物做成凹凹凸凸的市街，它鮮明的線條遮擋着視線，白色的倒影，在油一樣的海面上晃盪，船隻離岸很近，伸手可及。已經抵達香港了。

數十年來，從船隻駛入港口的一刻，由山巒、市街、海組成的構圖便一直散發着動人心弦的力量，牽引住從船上眺望風景的日本訪客的心神。不過，也有少數軍人，並不陶醉於這片山光水色中，而是趁機觀察香港防務的，如一九一一年四月乃木希典乘船入港時，他關注的就完全是香港的防衛佈置（第十七節）：

香港是英國在遠東的商業中心，與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一起，緊扼廣州灣的咽喉，是戰略上最緊要之地，因此英國不吝資本財力加以開發，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其建設實有可觀之處。自船上遠望，右方九龍山上有砲台二座；左方香港島山上有五個砲台和一個密閉堡壘。因為我不曾作研究，所以詳情不可知。乍看之下，其結構屬舊式，而防線確實又非常接近市區，令人聯想到英軍佈防，向來將戰力的中心放在海軍，不大重視海岸防禦。隨着船隻漸漸駛入港口，見右方九龍有一大倉庫，據某君說，是屬於英國海軍存放物資的倉庫，面不僅儲存補給艦隊的彈藥、糧食、煤炭，也收納了水雷等用於輔助性防禦港口的物資，因此，直接防禦的設備頗為齊備。

當然，乃木關注海港防務，主要是軍人的歷練使然，並不意味着軍方當時已懷有侵佔香港的野心，真正為計劃進攻香港而作軍事觀察、情報刺探，是及後二十多年的事。

山頂俯瞰、璀璨夜景

除港口外，登臨太平山頂俯瞰的勝景和晚上萬家燈火的輝煌夜色，也是日本旅客觀賞的焦點。自一八八八年纜車通車後，乘搭纜車到太平山頂觀光，幾乎已成為訪港日人必備的節目，乘搭纜車帶來了極大的感官上的刺激，山頂俯瞰則更令人歎賞不絕，面對眼前展現的萬千氣象，能文之士莫不殫思極慮，極力用優美的辭句去摹描：

自山上眺望，景緻較登備後千光寺山俯瞰尾道市街更為壯觀，港灣內帆船如豆，數千樓房為綠樹翠楊所裹，點點如畫，有如眺望唐人的青綠山水圖。再往上走時，山巔有兵營，憑石欄望天之一方，只見青山起伏，如臥蒼龍，山腳處為漫漫外洋，不見一只船影。二、三洋館，隱於煙柳間，豈不妙哉！（一九〇〇年大橋乙羽，第四節）

乘纜車登山頂後，有皇后花園，自那兒俯瞰，全港市區均在腳下，港內的巨型船舶都在吐煙，景色壯麗無比。打起涼棚，轉眼遠眺的話，茫無際涯的中國大陸沉埋於北方的地平線下，浩浩洋洋，恍如大海。（一九〇一年中村直吉，第九節）

此地達官貴人多築別墅於山頂，登臨俯瞰，千山抹黛，蜿蜒盤繞，近者含笑，遠者相迎，數百青螺，星羅棋布於水煙浩蕩間。一片黑雲掠空而過之際，丘壑間忽傳來汽笛的迴響，總之氣象萬千，愉快不可勝言。（一九〇二年濫澤榮一，第十一節）

我有好幾次跟朋友結伴散步到山頂去，在天朗氣清的日子，水雷母艦駛過波平如鏡的海面，九龍半島的遠處，層巒疊合，群山將半島和內地分隔。在地面水蒸氣騰升的日子，維多利亞城的市街宛如沉在水中；夜則腳下萬物無聲，有名的香港、九龍夜景看起來美不勝收。

（一九三七—三八年尾崎秀實，第四十五節）

這些篇章寫於不同時期，出於不同作者之手，然皆堪稱措辭典雅，用筆精妙，將海港如山水畫般的景緻如實地再現讀者眼前，讀來有歷歷在目之感，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作家、詩人，現節錄其中一、二片段如下：

自船上望香港，萬燈照水，與其說像映於天際之綺羅星辰，不若說像漫山鑲滿寶石。滿山滿港都掛上鑽石和紅寶石的項鍊。（一九〇〇年夏目漱石，第六節）

晚上，山腹一帶的市街亮起各式各樣的電燈，燦爛耀目，宛如寶石遍撒，美不勝言。

（一九〇二年島村抱月，第十節）

晚飯後走出甲板一看，漆黑一片的香港山上，自山麓到山頂都亮起五光十色的燈，像嵌在皇冠上的寶石般閃爍生輝。一顆一顆像是紅寶石和綠玉的燈，在南國濃密的夜空深處閃閃發光，充滿了生氣。這種景色，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一九〇九年寺田寅彥，第十五節）

當船隻駛入此港時，已過黃昏，走出甲板後，過份耀目的光線令我目眩。山崗較京都的圓山大十倍，建於模糊地令人感到是山坡樹叢間的一眾房舍，都亮起了藍色的、黃色的、紫色的燈光，還有近處海邊紅色的火等，一起映照於水中，此一情景，實在出乎人的想像。

（一九一二年與謝野寬、晶子，第十八節）

深夜時份的香港，從岸邊到黑忽忽的山頂為止，都亮起閃閃發光的燈，宛如一頂鑲嵌了珠玉的巨大寶冠，就是那高懸在中天、渾圓而帶黃色的月亮，遠望起來也彷彿一顆從冠上掉出來的寶石。想起來，今夜原來是陰曆九月十三的晚上。（一九三八年野上彌生子，第四十八節）

這些描寫夜景的篇章雖大部份取譬相近，不約而同以寶石來比方港內晚上亮起的各色電燈，但鍊字謀篇則各出機杼，剪裁巧妙，刻劃細緻，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將香港夜景懾人心魄之美凸顯出來。

跟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訪港的日本人相比，二十世紀以後訪港的日人心態上似乎較為悠游，很少再像前人那樣，汲汲於觀察香港的城市建設、軍備及施政，然後以好奇而略帶逼切的語調去報導所目睹的新鮮事物，以便為國家的現代化提供各種楷模。踏入二十世紀後，一來出國者日眾，不再局限於統治階層中的精英；二來通訊日漸發達，世界各地的形勢可透過不同的渠道取得；三來日本國勢日盛，民族存亡的危機感已逐漸減弱，出國日本人向外取

經、借鑒學習外國文化的心態已不若昔日那麼強烈，這種種因素，反映到訪港日人的著述上，就是用搜集資料、情報的態度去記錄香港事物物的人減少了，一般都不過以旅客的身份，到香港的名勝觀光，用閒適的心境欣賞風景和撰寫遊記。

既整潔又雜亂的市容

比起亞洲其他地方，香港的城市建設有其過人之處，訪港日人的記錄中很多都提及香港的街道整潔、樓房建築宏偉等，令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們坐小艇到達廣場。草地一片綠油油。剛從船上登岸的我們三個人，用好幾天不曾有過的穩定步履，踏足於有簷篷的行人道上。跟上海被煤屑弄得骯髒不堪的街道完全兩樣，香港的街道是英國式的，呈水洗過的蛋黃色，十分漂亮。（一九二九年金子光晴，第三十一節）

我們坐中國人的汽車繞島一周。在上坡路的路旁種有芒果樹和椰子樹等，我們沿右方是總督府的坡路上駛，感覺有點像處身於東京的靈南坂和永田町。道路雖然比後者狹窄，卻很漂亮。左右並排而建的樓房子，全都給人很好的印象。隨後，我們就駛上環島一周的公路，繞到香港島的背後，從那兒俯瞰香港的市區和星羅棋布的島嶼，景色甚為優美。（一九三六年高濱虛子，第三十五節）

汽車沿着海灣公路疾駛。我一直以為香港不過是一個近似圓錐形的島嶼，頂多外表美而已，現在看到兩旁美麗多彩的景色，不禁大為驚嘆。從車窗中可以望到在那緩急不等的山坡上，高級柏油馬路縱橫交錯，蜿蜒幾十哩，兩旁豎立着一座座舒適的現代化住宅，佈局格外協調，顯得異常美麗、別緻。香港的海灣之美，真可堪稱為東方的因佩理亞（Imperia）海角。（一九三八年西義顯，第四十七節）

剖開岩石鋪成的道路，無論哪兒，或者乘車兜圈子到哪兒，都好像磨過一樣平滑。沿路並排的純西式房子，看來所費不貲，房子除了能俯瞰下方伸延到遠外的海景外，還有花園和寬敞的庭院。（一九三八年野上彌生子，第四十八節）

整體而言，訪港日人對香港的印象甚佳，有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甚至指出：「遊覽香港是一直以來的憧憬」⁽⁹⁾；「跟塵土飛揚和充滿苦力臭味的上海相比，香港簡直是如詩似畫的城市。」⁽¹⁰⁾

不過，「如詩似畫」似乎只限於洋人聚居的地區，一旦步入華人聚居之地，不論是上環、灣仔的市塵，抑或是香港仔的漁港，這些日本旅客所感受到的環境、氣氛便截然兩樣，源於華人的不潔，欠缺衛生，這些地區全都喧囂嘈吵、齷齪污穢：

信步逛至一處市街，見成群華人無業之徒聚集，摩肩接踵，異常紛擾嘈雜。有人手挽豬膀子而行；有人邊走邊嚼甘蔗。既有吹喇叭賣唐人糖果的小販；也有吹橫笛以招徠酒客的店舖。

（一九〇〇年大橋乙羽，第四節）

往華人街遊逛。華人街不論在哪兒都不美觀。中國人為甚麼這樣缺乏衛生思想呢？我想這一點也是愚智之別吧。⁽¹¹⁾

那是處古老的市街。古舊、污穢的建築物林立，中國人把自己困在樓房的凹處開店，售賣香煙、食物。食物中有興趣的，是華人區內有人把池塘的源五郎蟲煎得黝黑來賣。總之，這兒是色彩斑斕、發臭、藏污納垢的地方。（一九三〇年石川達三，第三十二節）

（香港仔）狹長的港灣內泊滿了漁船，有些漁船將魚網弄成三角形，掛在並排的帆檣中晾曬。環繞海灣的小路，道旁就是盪漾的碧波，家家戶戶都塗上黃土製的紅色顏料。在海邊有一處似是市集的廣場，男男女女和小孩子都喧嘩吵鬧。滿頭白髮的老翁蹲在蕉販的筐前，在吃開始變壞的香蕉。牆壁上貼了一些廣告畫，藍藍紅紅的，色彩斑斕。呆然站立的中國婦女頭髮蓬鬆，衣衫襤褸。在前一站的淺水灣，即使像魚鷹覓魚那樣睜大眼睛去找尋鯢鯢的、醜陋的東西，也難得一見，跟這兒實在相差甚遠，但此處那種野蠻、未開化的不潔，卻凸顯了屬於中國式的紫黑色調，滿載頑強的生活意欲。（一九三八年野上彌生子，第四十八節）

從華人區得來的這種印象，毫無疑問會進一步加強日本人對華人的偏見、歧視。

對英國人、華人的觀感

在日本訪客的筆下，香港的英國人和華人可說是一正一反的兩極。對英國人，他們極力推崇，認為英國人富有智慧、耐力和勇於行動，憑藉這些美德和歷年投放的資金，英國人終於成功將香港由一處蠻瘴癘疫之地發展為世界上的屈指可數的大商港：

香港有今日之繁華，英國政府不知煞費幾許苦心，投下之資金逾數億。要之，惟英國人獨有之堅忍不拔精神，始能使此硤确不毛、瘴煙癘霧之地變為東洋第一寶庫。（一八九九年大谷光瑞，第二節）

我看香港及其他由英國人經營的東方殖民地，無不氣魄宏大、質實堅穩，歎賞之情，不禁油然而生⁽¹²⁾。

英國在殖民政策上全力以赴，投下龐大的金額，她在建設大香港上，只有叫人驚嘆的份兒⁽¹³⁾。

類似的見解，在日人的記錄中可謂俯拾即是。甲午戰後，日本攫取了台灣，一些過港的日本人看見英國人在香港種種的建設和透過香港賺取到巨額收益後，曾大聲疾呼，籲請日本的殖民主義者向英國統治者取經，作為經營台灣的藍本⁽¹⁴⁾。踏入二十世紀初，這樣的論調雖然少見了，但一九〇二年英、日兩國締結同盟後，兩國關係空前良好，過港日人對英國在香港的所作所為，不免仍多溢美之辭，以偏頗之見，將殖民主義者盤剝當地人民的行徑完全正當化。

日英同盟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一年先後兩度延長，直至一九二一年才為四國條約所取代。在同盟生效的十多年間，先後發生了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等重要事件，結盟基本上為兩國帶來一定的利益，尤其是日俄戰爭爆發前後，英國忠實履行協約，為日本戰勝俄國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日本人因此普遍對英國懷有好感。第一

次世界大戰期間，基於同盟之誼和本身的利益，日本政府迅速回應英國政府的「請求」，向德國宣戰，顯示同盟的運作良好。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趁歐洲列強無暇東顧，向華提出二十一項條款，暴露出將中國變為其屬國的慾望，因而引起英國的警戒，兩國在爭奪對華利權上矛盾漸生，關係亦轉趨冷淡，英日同盟屆滿之後，並沒有再延續。不過，儘管兩國關係時生摩擦，但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尚保持平穩，「有關東亞問題上，英國是列強中最先尋求與日本妥協的。」⁽¹⁵⁾ 在這樣的背景下，二十世紀前後訪港日人將建設香港的功勞，完全歸功於英國人及英國政府，且對之歌功頌德，是不難理解的。

至於對香港華人的印象，強調他們貧窮、刻苦耐勞算是較正面的描述。一九〇七年經港的有島武郎說過：「中國人實是個可驚嘆的民族，不論就勤勉、就忍耐力、就身體的頑壯而言都是。」（第十四節）後來的綠川英子則具體地刻劃出下層華人民眾的不同形象：

中國特有的貧窮在港口附近也比比可見。眼明手快的人力車夫、拿着粗繩子和杠棒的行李搬運工、各種年齡的報販——他們爭先恐後地向下船的乘客聲嘶力竭地叫喊。赤腳的婦女們身穿黑色布衫褲，用四周掛滿穗子的黑色寬邊帽遮着臉，擋着強烈的回歸線的陽光，熟練而迅速地把握離岸較遠的輪船上用繩子吊下來的行李卸到木船上，接着用男子般的大手拿起粗糙的船槳划向陸地。

（一九三七年，第四十四節）

比起貧窮刻苦，日人訪港記錄中更常凸顯的是中國人骯髒污穢的一面，大橋乙羽以蠕動的蛆蟲形容病床上的病人；石川達三以鴉群來形容圍攏在輪船四周的艇戶，可說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我往內窺看，見一最下等的中國人在無床褥的床板上起臥，如蛆蟲蠕動一般。異臭衝鼻而來，污穢難以言狀。（一九〇〇年大橋乙羽，第四節）

當船快要靠岸之際，烏鴉群便向船襲擊，說是烏鴉，並非真正的烏鴉，而是軀體瘦削、身量高、穿着黑色髒衣服，與烏鴉無異的中國人。他們把小艇挨貼到「拉普拉塔號」的船腹，沿着繩索飛快地

攀上船，然後迅速在甲板上開店擺賣骯髒的食物、工藝品、雜貨等。

（一九三〇年石川達三，第三十二節）

此外，在島村抱月、河東碧梧桐（第十、廿四節）等人的記述中，華人無一例外是當時受人戲弄、遭人虐待的一群，既無志氣，亦缺乏反抗的勇氣。即使有些日本人認識到東亞社會上白人和有色人種是兩個儼然有別的階層，白人高高在上，有色人種——包括中國人和日本人在內都給墊在下層，不但生活艱苦，連做人的尊嚴亦備受踐踏，然而，對於這種不公平的現象，他們表現得十分冷漠，代抱不平或寄予同情者，可謂絕無僅有。明治維新以後，一方面由於中國積弱，被列強欺凌而無力反抗；另一方面由於日本統治集團內一些別有用心人士的宣傳和煽動，蔑視和輕侮中國人在日本國民中成了一股很大的傾向⁽¹⁶⁾，訪港日本人對中國人心存侮蔑，有意無意誇張其負面的形象，跟這種精神意識是一脈相通的。

居港的日僑、日本人社區

訪港日人的記錄中還提到居港的日本僑民。戰前居港的日僑，人數不多，一九一〇—二十年代平均每年在一千五百人上下，一九三〇年代初增至一千八百人，一九三二年因「九一八事變」引發大規模的反日暴動，日本僑民一度撤走，未幾，局面恢復平靜，人數又徐徐上升，但數目始終不逾二千。日僑人數雖然不多，但由於所屬階層不同，長期以來都分成兩群：

一是稱為半山區的一群，他們以領事館為首，加上三菱、住友的分店和正金銀行等大機構、大資本商行的職員、家眷。此外，數目雖少，還有如江商等帶有商人氣質的個人企業家。至於另外一群，是盤踞在旅館周圍、稱為灣仔地區的落魄者。……他們有人販子、船員出身的小賭徒、遊民、鴉片夫等，人數不詳。（一九二九年金子光晴，第三十一節）

換言之，一批日本人接近白人的「上層」；另一批則接近中國人的「下層」，兩批人在感情和利害關係上一直對立，心存芥蒂，早在一九一〇年代船津辰一郎擔任駐港領事時，雙方已因招待訪港日本練習艦隊的安排而「鬧得很厲害」⁽¹⁷⁾，一九三七年，改造社在香港舉行座談會時，與會的平岡商會平岡貞在發言中也坦白承認雙方的關係一直欠佳⁽¹⁸⁾。

在訪港日人的記錄中，「上層」日本人的住處、日常生活等較為罕見，到後來藤田一郎寫了一些回憶的文章，一九六五至六六年間又與下川憲久多次對談，才有較多的披露，反而「下層」的人販子、賭徒甚至亡命之徒的片段卻可見於當日村岡伊平治、金子光晴的回憶（第十三、三十一節）和參與「老香港座談會」人士的發言中。此外，透過作家島崎藤村的描述，我們也可約略窺見「下層」日本人聚居處的風貌。島崎藤村於一九一六年自法國回國，郵船在駛經香港時，他曾登岸稍事勾留，為了吃一頓久違了的日本菜，島崎藤村特地鑽進日本人區去，在那兒轉了一圈，得到的印象是那一帶毫無生氣，衛生環境也糟透：

懶慵的陽光射入這教人晝夜不分的一隅，一切事物都顯得昏昏疲憊，靜寂無聲地似在打瞌睡。午飯也吃得不如意。進食中，無數的蒼蠅飛來纏繞不休，我差點就把一隻蒼蠅連碗中的飯一起送進嘴。

島崎藤村所到之處，應是灣仔一帶吧。對於日本人聚居處那種特異的氣氛，島崎藤村謂並不覺得陌生，因為在東亞的海港內，例如新加坡、西貢等地，「下層」的日本人大都聚居於同樣陰暗沉鬱的街巷中。為甚麼呢？這該與日本僑民在亞洲地區的發展模式有關：

日本人前往發展的地方，最先行的拓荒者就是勇敢的大和撫子、日本娘子軍。隨後，男的就必然在附近開店，巧妙地保持聯絡，一舉兩得。這種不光彩的巧妙戰術，至今在各地依然可見⁽¹⁹⁾。

在香港，一八九〇年以後，隨着市區向灣仔伸延，下級的日本娼妓漸由中環向東移，二十世紀初開始在灣仔

一帶生根，「『娘子軍』及『紅裙隊』」的大本營在灣仔舢舨街，狹窄的街巷內，軒燈煌然，成排搖曳，歐陸式的樓房，改裝成和式的店子。店頭擺放着椅子的行列，營造出奇特的風貌。紅綠色的燈泡發出斑斕的光芒，幾許婦女就在夜幕下強顏歡笑，這道攀花折柳的巷里，是在海外難得一見的活圖畫。嫖客稱此遊里為『眾議院』，以別於設備稍為周全的、俗稱為『貴族院』的花街柳巷。」⁽²⁰⁾以灣仔紅燈區為中心，由日人經營的旅館、日用品商店以至飯館等漸次衍生，成為日人聚居的地點之一，島崎藤村造訪的，就是這處地面。

關於戰前日人在港生活的情况、活動，中文、英文的媒介素來甚少報導，一方面，日本僑民的人數不多，即使商賈能佔一席位，但政治上並無實質的影響力，存在感相對薄弱；另一方面，基於言語隔膜、生活習慣殊異，加上要在濃厚的反日氣氛下謀求自保，日本僑民也傾向於生活在自我封閉的本國人社區中，以致其內情況不大為港人所瞭解，訪港日人對日僑的記述雖頗為零碎，但由於同類資料缺乏，自然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一九三〇年以降的訪港記錄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日本受世界經濟危機的波及，商品、股票價格暴跌，對外貿易銳減，中小企業紛紛破產，為着擺脫這次經濟危機，日本轉向建立優先發展軍事生產的戰爭經濟體制，同時又加速侵略中國的步伐，先後發動「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在侵佔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同時，又不斷向關內擴張，將華北置於其勢力範圍之內。

濃厚的反日氣氛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種種侵略行徑激起了國人極大的憤慨，在濃厚的愛國熱忱和仇日情緒驅使下，示威、杯葛日貨甚至暴動此起彼落，嚴重的民族危機也激起了港人同仇敵愾之心，國內每有反日運動爆發，港人無不熱

烈響應，在這種背景下，戰前的港日關係踏入了最惡劣的階段。最先對這種氣氛有所感受的，是一九三〇年訪港的石川達三（第三十二節）：

我離開人群走入街角的公廁。抬頭一看，怎麼搞的，四面牆壁上寫滿的塗鴉大部份都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我在此切實地感受到國家、異國，感受到羈旅之身，感受到四億中國人進逼到身旁的白眼。我好像成為日本的代表，被帶到他們的面前接受審訊。不知為甚麼，我竟沒有生出敵愾之心。

一九三七年大宅壯一訪港時，更親眼目睹中國少年寫反日標語的情景（第四十二節）：

在酒店的入口處，我有了第二個發現，不禁冒出一身冷汗。我們的汽車停在酒店門前之際，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正用粉筆在酒店的招牌上塗鴉。他看到我們後慌忙便把塗鴉抹去。不過，在抹去之前我已清楚地看到「打倒……」的字樣。聽說這個少年是酒店內設有辦事處的某家俱樂部的侍應。

比起寫標語驚心動魄得多的，是「九一八事變」後不久香港爆發的反日暴動。暴動於九月廿三日晚上發生，局面其後迅速失控，日人的商店遭破壞，居住在九龍城的山下澄次郎一家六口被殺，港英政府於廿七日頒佈戒嚴令，出動軍警鎮壓，並緊急將日僑集中於日本人小學等處避難，關於這次暴動的詳情、港府、日本駐港領事館的對應等，日方保留着大量的檔案，不過，能從當事者的立場，追述危機之際那種緊逼的氣氛者，應推平岡貞的《自傳》，他描述一家人倉皇逃難的經過和事發時幾於斷炊的狼狽情景，清楚描述出亂世浮生的悲歡。

事實上，一九三〇年代以降，居港的日僑日子並不好過，藤田一郎戰後回憶，「九一八事變」之後，「個人生活總飄蕩着不安的氣氛，心情漸漸變得不大愉快。」（第五十一節）特別是一些在港做買賣的中、小商戶，面對嚴峻的時局和一浪接一浪的排斥日貨運動，處境實在異常艱辛，一方面貨物積壓，導致現金周轉不靈，經營陷入